神圣的解构与现代性狂欢 ——《我弥留之际》中“苦难与救赎”的反向书写研究

韩胜杰

(湖南大学, 湖南省长沙市, 410082)

摘要:“苦难与救赎”是《圣经》传统中的重要母题。福克纳在小说《我弥留之际》中延续了对这一母题的化用,讲述了本德仑一家长达十天的送葬之行。但在《圣经》母题的神圣外衣下,小说以色彩对立的强烈反讽,揭露了“苦难之行”的荒诞本质,更在无信仰、无理性的“非英雄”群像建构中排斥了他们获得救赎的可能性。在多重负面意指中,福克纳通过剥离“苦难与救赎”母题的神圣外衣,在文学诗性与宗教神性的对峙、交融中暗示着现代人的精神荒原,给予现代的哲思。

关键词:福克纳;《我弥留之际》;苦难与救赎;反向书写;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J

引言

《我弥留之际》是福克纳继《喧哗与骚动》之后的又一重要作品。小说讲述了母亲艾迪过世后,本德仑家族由父亲安斯带领历尽艰险将遗体送回老家杰弗逊城安葬的故事。作为三十年代具有实验性质的重要作品,《我弥留之际》延续了作家对意识流、复调视角等现代技法的运用,更强调了对《圣经》的吸收与模仿。正如评论家菲利普·鲁尔所言,“没有哪部小说像《我弥留之际》一般从主题到风格更皆尽《圣经·旧约》了……主题、态度以及频繁使用的措辞都来自于对‘前基督教’体验的书面表达。”^{[1]107}

福克纳“把这个家庭放置到人类可能遭受的两种最可怕的灾难之中:洪水和大火”^{[2]87}。故事中,本德仑一家为满足亡灵遗愿而踏上“苦难旅程”的主体情节紧密呼应了基督教“受难与救赎”的传统母题,其间涉及的洪水、火焰等意向也均可在《圣经·旧约》框架中找到对应的解读^①。虽然母题作为最小的文学要素不具有主观倾向,但基督教背景中“受难与救赎”的母题往往暗示着个人在隐忍中走向神性哲思的建构导向。基于以上观点,部分学者认为《我弥留之际》是对《圣经》传统母题的置换,折射了在个体在责任与义务的驱使下忍受苦难,即“斯多葛式的坚忍这唯一的价值”^②,最终谋求宗教救赎的神圣内涵。但这种观点带有强烈的“神正论”色彩,将作品表层的宗教性而非文学性作为解读《我弥留之际》的切入点。

如福克纳所言,“对我来说人是第一位的,(宗教的)象征意义是第二位的。”^{[3]90}在作品中,“苦难与救赎”母题虽然渗透着宗教性,但它并非小说的内涵,同时也因其与《圣经》不同的负面意指形成了“神圣的断裂”:《我弥留之际》苦难框架下的旅程不过是一场荒诞的游戏。父亲安斯想要一副假牙、迎娶“新婆娘”,杜薇想进城买打胎药,瓦德曼想去看橱窗里的小火车。人物缺乏信仰、毫无理性,无意义地牺牲和透支着生命,更无意寻求“救赎”的可能性。那么理解《我弥留之际》对“苦难与救赎”这一“神圣母题”的化用手段,讨论作品对《圣经》神圣性的消解将成为阐释的关键。

^①洪水与火焰在《圣经》中具有毁灭和惩罚的神圣意义,成为人类苦难的两个主要来源。如上帝降暴雨形成大洪水,用以毁灭人类,“再过七天,我要降水在地上四十昼夜,吧我所造的各种活物从地上灭除”(《创世记》7:4)。再如《启示录》关于火的预言,“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启示录》20:14-15)等等。

^②参见王钢:《苦难与救赎:神正论视阈下〈我弥留之际〉再诠释》,见李伟昉主编.比较视野与经典阐释[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01.参见[美]哈罗德·布鲁姆著;黄灿然译.如何读,为什么读[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269.

为此,文章将从“苦难”母题的荒诞隐喻,“救赎”母题的错位表达两方面,来讨论《我弥留之际》中对神圣母题的反向建构,并在整体负面的意指中寻找福克纳“去神圣化”的审美意义。

一、“苦难历程”的荒诞隐喻

在《圣经》传统中,苦难源于人生的原罪,人类群体的堕落与罪恶受到了来自上帝的审判。因此经受苦难是个体历练的方式,是在危急处境中实现精神升华的神圣、自发行为。如《圣经》中约伯遭受上帝考验,主动受难,以持虔诚的态度拥抱宗教神性得以赞赏的故事。这种与受苦受难紧密关联的行为逐渐生成“苦难”的神圣母题,影响后世的创作。

福克纳在《我弥留之际》中同样化用了来源于西方传统的“受难”母题,但却在情节构思中呈现出了被迫的、世俗的、可有可无的荒诞性。《我弥留之际》中的“受难”无非是一场奔赴杰弗里镇的送葬之行。与《圣经》中上帝降临并施以苦难不同,本德仑一家遭受的苦难历程不过来源于亡者的一己私心和刻意报复,“我的报复是……死后把我运回杰弗逊安葬”^{[4]130}。艾迪的愿望与《圣经》中雅各的希望相似,“我将要到我列祖那里,你们要将我葬在赫人以弗仑田间的洞里,与我祖我父在一起”^{[5]248}。但作为亡故者,艾迪没有后者的高贵身份和神性精神,甚至是一个缺乏信仰的“异端”,“她的眼里并没有上帝”^{[4]142}。

在这种私有、报复性质的荒诞意图中,充满艰辛的送葬之行如期展开,但“送葬”过程的诸种要素逐渐消解了来自于宗教的神圣仪式感。一方面,艾迪的尸体被多次开棺、挪动,甚至在无意间遭到了破坏,“他们把盖子打开时,发现有两个眼在钻的时候钻头一直钻到她的脸上”^{[4]64}。而作为“苦难”预示的洪水与火焰也对尸体造成了严重的损伤,“棺材意味深长地卧在大车的底板上……沾了两道长长的泥斑”^{[4]132}。棺材的变形暗示了躯体的扭曲和腐朽,而可怕、难以压抑的臭味更是与芬芳、美好相对,“我闻到了从远在一英里之外的田野里都能闻到那股味儿……秃鹰一圈又一圈地盘旋着”^{[4]166}。这些来自于纯粹肉体性的民间表达更让人联想到巴赫金的狂欢化诗学——在本德仑一家对送葬仪式的漠视中,“母亲-子女”、“妻子-丈夫”的社会亲缘关系被解构出来,腐臭的肉体消解了封闭的、不可侵犯性的神圣特质,呈现怪诞的形象特征^[6]。

对死亡崇高性,以及肉体完整性的漠视背后,可以发现“苦难”对于本德仑一家更像是意料之外的东西,他们心甘情愿地受苦另有深意。父亲安斯是这场“送葬之行”的推动者,“我向她许下了诺言,这对我来说很神圣”^{[4]119},但驱动他完成诺言的动力是顺便去城里装一副假牙,甚至在“苦难”之后得到了“一位新婆娘”的弥补。女儿杜薇参与“苦难之行”的目的在于求得堕胎药,连小儿子瓦德曼也陷入了物质的陷阱,仅仅在于得到橱窗中的小火车——他们宁愿在无痛且圆满的历程中实现梦想,而不是托带着累赘般的死尸接受“苦难”的预言。由此看来,他们踏上的“苦难之行”更像是“欲望之行”的附属品。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概念中,《我弥留之际》中本德仑一家的“苦难”之行不过是“本我”意义上的空洞行为,即依据本能和欲望无意识地寻求满足^[7]。他们忽视了“自我”的压抑和“超我”的理想伸张。所以作品无法在道德和伦理自律中建构“受难”母题的神圣性,使之成为了“堂吉诃德式”的历险闹剧^{[4]7}。

虽然他们无意受苦,“苦难”却以宿命般的方式不可阻挡地降临到身上:卡什为拯救棺材落入河中摔断左腿,珠儿在火灾中烫伤背部,杜薇在寻药中被药店伙计诱奸。但这些个体性的苦难往往得不到他者和集体的怜悯。卡什的断腿被草草用水泥包裹,成为造成截肢的主因,“用生水泥糊弄……准是多长了两条腿的畜生”^{[4]209};杜薇买药的十块钱被父亲安斯夺走,“我的亲生女儿吃了我十七年饭,还舍不得借我十块钱”^{[4]224}。家族之间的冷漠与自私暗示了在苦难中四分五裂的亲缘关系,产生了与《圣经》母题下互帮互助、共同实现精神净化相反的讽刺意义。

“苦难历程”中荒诞的特质同样表现在他们对“替罪羊”的容忍与默许之中。“替罪羊”在原初意义上是用以消解危机的手段，带有牺牲和受难以拯救群体命运的高尚性。^{[8]29}但《我弥留之际》中展现的确是一幅肆意使用“替罪羊”拯救自己、满足私利的图景。面对洪水的灾难，当“原木……像基督直立在荒凉水面”^{[4]124}时，两头骡子被珠尔果断抛弃，“放开绳子！远离骡子”。骡子作为本德仑一家的“献祭”替他们而死，作为“替罪羊”在死亡的前一刻显示出了荒诞般的仇视与嘶吼，“骡子突然露出水面……朝我们望了一会儿，发出一声几乎类似人发出的声音”^{[4]124}。对于本德仑一家而言，牺牲的骡子无非是财产的一种，他们顾虑的只不过是其他可以被拯救的财产，“找到了直角尺”“我捞到锤子了！看来我们应当把墨线斗捞起来”^{[4]136~142}。同样，身为家族成员的达尔也被冷漠地当作“替罪羊”，抵消火灾带来的损失，“没有别的办法，不押送他去杰克逊，就只好让吉莱斯皮来起诉我们，因为它似乎知道是达尔放火烧了谷仓”^{[4]202}。达尔成为“替罪羊”是本德仑家族其他成员默许的结果，目的在于清除“异类”，避免被起诉而导致的损失。对他们来说，这是逃避“不必要苦难”下的必然抉择，即使“替罪羊”并无太大过错。作品暗示了达尔的牺牲起因于杜薇的告密，“她没有吭一声，甚至连看都没有看他一眼”^{[4]206}，这清晰地反映了家族成员之间脆弱而矛盾的感情关系。这与《圣经》中统一领导，共同奔赴虔诚前景的“苦难旅程”恰恰相反，显示了伦理与性格的本质荒谬性，暗指了共同受苦的不可能性。

因此，福克纳的《我弥留之际》是对《圣经》“受难”母题的反向建构。从“苦难”的来源来说，长达十天的送葬之行不过是源于艾迪的私人报复。“苦难”的承受者本德仑一家也不复《圣经》传统中戮力同心、共赴自赎之路的朝圣者和信仰者，而是在“本我”欲望驱动下的“行尸走肉”。在荒诞的“苦难”历程中，他们愈发暴露出荒芜的精神本性和破裂的亲缘认同，这预示着走向精神救赎的不可能性。

二、救赎背后的虚无与狂欢

基督教的概念中，受难与拯救是互为因果关系的，受难是拯救的根据，拯救是受难的结果和终极目的。^{[9]98}因此《圣经》的“救赎”主题往往与“受难”母题相关，构成较为完整的“苦难-救赎”逻辑链条。由上文所述，福克纳的《我弥留之际》以“反神圣化”的方式建构了荒诞的“苦难之行”，作为“苦难-救赎”逻辑链条的下层，救赎能否成为可能是第二个核心问题。

从神正论视角来看，救赎意味着人物得以实现精神升华，不仅能够塑造出较为完整和谐的人性，更能在此基础上收获神性——基督就是获得救赎的完美形象，他具有完整的神性与完整的人性^{[10]82}。《出埃及记》中的英雄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在旅行中经受考验，既是“人性所面临的各种经历与挑战”^{[11]131}，又是在肉体生存之上对神的领悟和灵魂的净化。对比来说，《我弥留之际》中的大部分人物在“人性”与“神性”两个维度似乎都处于缺席状态，趋于“非英雄”形象——他们在无意义的痛苦中忘却了救赎之义，在虚无主义和盲目狂欢中失去自我。

（一）失落的神性：信仰危机中的“无救赎”

“神性”是基督教传统中精神净化的概念。它是人在认知自我本性与状况之后的自我救赎，依托虔诚的信仰和对苦难的隐忍而实现。正如加缪所说，“荒诞，就是没有上帝的罪孽”^{[12]41}。《我弥留之际》中的很多人物在反宗教、无信仰的精神危机中失去了对“神性”与救赎本义的探求，虚无空洞、卑劣自私地生存着。

艾迪是隐藏在作品深处的核心叙述者，也是信仰危机的肇始者。她接受了父亲的悲观主义哲学，认为“活着的理由，就是为了过那种不死不活的漫长日子做准备”^{[4]142}。在琐碎、烦闷的婚姻与日常生活中，她愈发认识到人与人之间的隔绝，忍受着无时不在的空虚感。她恨安斯虚假的爱，认为爱情“只是填补空白的幻影”^{[4]144}，她更恨盲目将子女降生到这个充

满罪恶的世界，“活着是可怕的，生小孩是婚姻的报应”^{[4]145}。正是出于自身的敏感和惆怅，她向“上帝的代言人”牧师维特菲尔德寻求解答。但换取救赎的希望被牧师懦弱、自私的性格所消解，艾迪最终消极地否定了信仰，否定了世界的一切，成为彻底的虚无主义者，“她比上帝知道得多，比人世间那些与罪恶不断抗争的人知道得多”^{[4]139}。于她而言，宗教与信仰是关于上帝的消极骗局，因为看似神圣的神灵背后隐藏着人类的罪恶与肮脏，“神性”也不过是可望不可及的幻影，救赎愈发成为不存在的泡沫。

与艾迪不同，《我弥留之际》中的二儿子达尔在我看来可能是最接近“神性”的人。故事中的艾迪与达尔都拥有不被认同的孤独与敏锐，但后者的孤独并非是艾迪式的极端而虚无的孤独，而是超脱于普通人的先验思想与诗意体验——他的信仰不在于宗教本身，而在于宗教性背后的人类理性与本真。为此，达尔的视角在全书五十九个叙事片段中出现了十九次，更被作者赋予了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能够洞见真实：他在离家运货途中率先知道了母亲艾迪的死亡，“他说他知道了……我明白他早知道了”^{[4]26}；他最早发现了珠尔“睡魔”的秘密，“我见到他立刻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4]112}；凭借特殊的感应，达尔也洞察了杜薇怀孕的秘密，“他的一双眼睛游离地落在一个个关注点上：我经历着分娩的阵痛”^{[4]103}。文中，达尔试图纵火将母亲棺材烧毁的努力也是出于某种“神性”的指引，是超越了本德仑一家卑劣本性的自我救赎。“达尔觉悟到我们当中应该有人出来有所作为，我几乎可以相信他在某种意义上是做对了”^{[4]199}，这种作为是他出于理性的救赎，让人想到“普罗米修斯”式的英雄永雄：他用“神火”对抗黑暗与荒诞的现实，消解对死亡崇高性的淹没以及对神圣躯体的亵渎。但在“救赎”缺位的现实中，普罗米修斯式的行为无法得到人类群体的普遍认可。达尔的“神性”哲学终究沦为了社会“异端”，借以精神病的名义实现精神的隔离，逼迫“神性”的自我破灭与解体。这恰恰说明，“在作品中真正具有权威性的代言人不是任何个体，而是整个社会”^{[13]44}。从反面来看，社会对达尔的囚禁预示着他们对理性哲学与纯粹信仰的敌视，只能在怀疑与空洞中将“救赎”作为一种虚无的空想，在盲目荒唐的个体认同中无意义地生存。

为了展现这些缺乏信仰，背离“神性”的“乌合之众”，《我弥留之际》采用了十五个叙述者的五十九个叙事片段。在不可靠的叙事结构中，不同人物彼此间的矛盾和冲突被主观扩大化了。仇视与嫉妒等真实的“人的心理”不仅扭曲了叙述者自身，更破解了被揣测人物的完美性，这会将人物品格导向“真实的人”，而非“完美的神”。对比古希腊史诗中的“英雄”，以及《圣经》中神圣人物的塑造来说，他们往往利用上帝的全知视角俯视英雄行动，为人物品格定性。他们虔诚、受难并最终获得救赎的圆环中，“神性”作为唯一且确定的属性被单一叙事建构出来，引发观者对“救赎”宗教意义上的哲思。但《我弥留之际》却与之相反。以常常被学者解读为“基督”化身的卡什形象为例，自我观念中的“我”是一个严谨、务实的木匠，“钉子钉住的面积要大些。每个结合口的咬合面积要大两倍”^{[4]71}，但这一单纯的形象在科拉的视角中并不受欢迎，“总是忙着忙那没什么意思”^{[4]43}；在安斯的眼中，卡什的木匠技艺是一种浪费，“怎么会有非要学木匠的想法呢，还逼着我为他交学费”^{[4]33}；达尔被抓时的言语中，卡什成为了毁灭信仰的帮凶，“那样对你比较好”^{[4]197}。由此可见，在内聚焦的多重视角中，他正面、木讷的形象出现了裂痕，自私与愚忠的性格隐现出来。这逐渐消解了他成为“耶稣”一般拥有“神性”的可能性，而在他信仰的丧失中，救赎也愈发成为不可能，最终成为社会群像中“较为高尚”的一员。

所以，《我弥留之际》中的人物群体或者是背弃信仰、走向荒诞的虚无主义者，或者是高扬信仰却杀死信仰的无知群盲。他们将一切“神性”视作异端加以排斥，不但无法找到救赎的路径，更亲手消灭了得以救赎的可能。

（二）迷茫的人性：堕落背叛中的“反救赎”

人性是与神性相对的概念。在基督教教义中，“神赋予人灵魂，使其具有向上向善的本

性、具有辨别是非善恶的良心……一切都是为了人的救赎。”^{[14]23}为实现救赎，代表善良、高贵的人性是另一维度的要求，也是实现神性洞察力的基础。如安德烈·纪德所言，福克纳的人物缺乏灵魂，也就是说缺乏作为人的精神价值。^{[15]273}这反映在《我弥留之际》中，他们不仅丧失了对“神性”探求的意愿，更失去了作为人本身的品格，在“救赎之路”的对立面陷入迷茫。

人性之爱是基督教意义中最核心的品格，其中所涉及的爱情、怜悯、同理心等等均构成了基本要义。但《我弥留之际》中，这些要义在本德仑家族中彻底消失了，成员彼此之间的冷漠让他们在自我煎熬中走向精神的荒芜。艾迪激烈地否认着“爱”的字眼，“叫‘爱’还是‘安斯’都没有什么关系”^{[4]147}，甚至剥夺了“爱”的意义，使之成为了可有可无的符号。在轻蔑的言语态度中，艾迪反映了现代意义上对语言本质的看法^③。她以认识论的方式重新认识了本体论意义上的“爱”字，消解了表达爱、拥有爱的可能，更丧失了爱的能力——她不爱安斯，不爱子女，更不爱存在于世界上的一切隔绝，“他们心中都藏着私心和秘密，都留着彼此不同的血液”^{[4]143}。为此，她残忍地鞭笞着他者，使她的“血水永远永远地在你们的血液里留下了印记”^{[4]144}。

作为丈夫的安斯也是丧失人性的一个形象。在追求艾迪时，安斯“双眼直盯着我，活像闯进陌生院子的两条猎狗”^{[4]146}，偏于动物性的野蛮描述暗示了他“人性”的缺席。他根本不懂“爱”的意义，却仍在婚姻的骗局中以此为名欺骗着妻子，使之成为发泄欲望的工具，“他躲在一个词（爱）后面……捅破纸从背后朝我一击”^{[4]150}。他时常深陷物质和财富的考量中，将其作为高于亲情的东西，为谋求小利置送葬之事于不顾，“整个下午坐在树荫下讨价还价”^{[4]157}，更是私自将珠儿心爱的马作为抵押，抢夺杜薇的钱为自己置办假牙等等。这种为满足一己私利而罔顾人性的做法显示了他作为南方农民的小市民心态，已经自私、卑劣的本性。

作为本德仑家族中的父辈，其人性丧失往往会导致四分五裂的家庭关系，使子女在泛滥的教育与冷漠的环境中沦为异化的产物，呈现某些“非人”的倾向性。杜薇是家族中唯一的女儿，成为了《喧哗与骚动》中凯蒂式的人物。在理解爱、掌握爱之前她便轻易陷入了拉夫带来的“欲望陷阱”，在盲目自救的道路上难免再次沦为性的牺牲品。这种性的堕落对应着《圣经》伊甸园中偷食禁果的夏娃形象，暗示着她所具有的“原罪”，但罪恶是无法通过完美人性和忏悔得到救赎的。因为她认识到，在缺乏同情与怜悯的家庭中无法得到任何帮助，达尔作为知情人更是给自己造成极大的威胁。为此她只能在背叛中“杀死达尔”，异化成为“非人”的一员。珠尔的“人性”丧失同样来源于家庭，他私生子的身份使他在缺爱环境中更加极致地认识到了温情的隔绝，这种来自亲缘的冷漠使他走向封闭，习惯以暴力抗衡和表达爱意。为此，他把最真实的爱都转移到马身上，更将自己变成了“半人半马”的畸形形象，在人性与兽性的融合中建构身份认同。本德仑家族中最小的儿子瓦德曼本应拥有最单纯的品格，但却在类似“白痴叙事”的过程中将理智、完满的人性消解了。他在天性使然中质疑着死亡的本质，并将其化为言语断裂表现出来，“俺娘是条鱼”^{[4]72}，但这种碎片化叙事也暗示着不健全、非理性的人格品行。同时，他对“杰弗逊镇橱窗里的小火车”的向往象征着他欲望的觉醒，结合他作为南方贫穷家族幼子的身份来看，无非是对“南方-北方”、“城市-乡村”、“富有-贫穷”二元对立中强者的认同。这意味着南方人在精神冲突中人性的堕落与精神迷茫，是家族一代又一代的恶性循环。

③ 艾迪对“爱”，以及对安斯、达尔等人名的具象化思考是基于语言学层面的，这种对语言定名意义的思考使人联系到现代语言学转向问题。20世纪语言哲学转向后，人们对语言的认识从本体论转向认识论，即“我们不再独断什么东西存在，而是通过对人类怎样认识世界来确定什么东西存在”。语言的意义被剥夺、沦落为一文不值的符号，人之存在的荒诞借此表现出来。由于艾迪对语言符号性的深刻理解，她逐渐否认了社会话语中的“家庭”、“爱情”、“子女”等概念，延伸出虚无无意义的个体荒诞概念，进而证明自我思想的正确性。

三、“现代神话”的破灭哲思

由上文所述，福克纳在《我弥留之际》中化用了“苦难与救赎”的《圣经》母题，却在细节书写中用“罪恶与迷茫”的深层内涵消解了母题的神圣性。“苦难”沦为无关紧要的表演，“救赎”也因大量异化人物的存在而丧失了本真性，荒诞愈发为古老而神圣的母题提供了一层悲凉的现代底色。那么作者在《圣经》母题下构建色彩对立的“现代神话”究竟有何审美意义？

首先聚焦于对《圣经》母题的宗教性问题。虽然在《我弥留之际》中一切神圣的因素都被消解，但这并非意味着福克纳的“反宗教”内核。事实上，福克纳作为美国“圣经地带”诞生的重要作家，基督教在他的生命中占据意义非凡的位置，“基督教是每个人的行为准则”^{[16]75}。《我弥留之际》对圣经母题的“转换再生”是借助宗教要素，在信仰与文学诗性之间进行的深度融合。因此作品对神圣性的反向书写，正是诗意的文学表达，目的在于从宗教框架中找到一条全新的、具有现代特质的“苦难与救赎之路”。由此，与传统的《圣经》母题产生遥遥呼应。

为实现这条救赎之路的建构，他将神圣、荒诞两种极端的要素杂揉起来，在色彩的强烈对立中凸显了现代性的讽刺。正如批评家米尔盖特所言，故事具有一种阴霾的狂想曲式的气氛，但在某种意义上……是整个人类现代经验的一幅悲喜剧式的图景。^{[17]110} 喜剧作为表层，悲剧作为内里，《我弥留之际》以“牧歌”的方式概括了人类世界复杂的本质^{[18]88}。其中，福克纳以一个家庭、一场旅行的形式创造了讽刺的深层审美空间，在冲突中的“不和谐”因素被暴露无遗。

现代人的信仰危机是小说反向建构的核心之义。在《我弥留之际》中，危机并非单指宗教意义上的怀疑与虚无，更暗指了更高层次的人类理性与道德。作品中充斥着大量在信仰边缘挣扎的人物：质疑上帝、否认生存意义的艾迪，空虚冷漠、贪恋物欲的安斯，消解死亡、反叛家庭的珠尔，自寻堕落、背叛亲缘的杜薇等等。他们背弃了宗教信仰和旧的伦理道德，理所当然地建构起属于自己的一套现代价值观。事实上，从本德仑一家的行为表征中恰恰可以找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西方世界的缩影。在“上帝死了”的观念中，基督教对“受难与救赎”的约束性骤然降低，现代人试图在物欲横流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谋求财富，享乐主义代替了受苦受难的基督教思想，物质追求也压倒了“精神救赎”。人们在盲目而激烈的竞争中陷入了精神的迷茫，产生了自我的“异化”。唯有屈从于新的世界法则，无信仰、无道德的自私者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这正呼应了文中“圆满”的尾巴，安斯作为最卑劣、最空虚的“非人”竟获得了全部愿望的满足。丑恶的人获得胜利的荒诞结局极易引发震惊与反省的哲思，这是福克纳在荒诞游戏中的沉重底色，寓意了现代性的教训：如何建立信仰，摆脱精神荒原才是隐藏在小说中的审美内核。

在对人类信仰危机的描摹之外，福克纳也在小说中暗藏了“城市-乡村”二元对立的冲突模型。这趟苦难之行的起点是贫穷落后的乡村，终点是杰弗逊镇。对于生长于美国南方小镇的本德仑一家，城市是向往的天堂，因为那里充斥着种种欲望的想象。小儿子瓦德曼对小火车的幻想正是如此，“城里会有的，圣诞节一到就会有的”，在渴望中甚至开始嫉妒出身，“我是个乡下孩子……为什么我不是一个城里的孩子呢。上帝造了我。我又没有跟上帝说把我造在乡下”^{[4]56}。父亲安斯二十多年未曾进城，终于能够借妻子的亡故进城安假牙，甚至找到城里的“新婆娘”。但从另一方面，他们在对城市渴望的同时，也固守着作为乡村人的身份认同，既深感自卑，又因不公平的环境而敌视城市。“在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里，一个诚实、勤劳的人无论在哪儿都得不到好处。那些在城里开铺子的人一滴汗不流，却靠流汗的人养着”^{[4]94}。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前沿，城市迅速实现了物质的现代化，原有的城乡差距愈发明显，这对二十世纪美国的城乡结构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从另一方面，城市所附属的物质文明极大地冲击了原始、自然的乡村社会，加速了乡村旧有价值观的解体。善良、勤劳、

忍耐与救赎的乡村精神被打破了，正如本德仑一家与塔尔、阿姆斯特德等家庭的对比一样。走在文明解体前沿的前者冷漠无情，将“送葬之行”物化成一种摆脱乡村文明，实现“到城市去”的一种伪装。而后者则保有乡村的品格：虽然不免狭隘、保守，却更宽容、善良，充满神圣的宗教信仰。

最后，小说也在叙事中隐藏着对“现代性沉默”的批判。在《我弥留之际》的整个“苦难”旅程中，作品都以内聚焦的方式讲述着不同人物的内心独白。虽然在视角的同构中实现了内在对话性，但也压抑了外在对话的可能。无论是艾迪、安斯，还是达尔、珠尔，他们活在自己的视野中，封闭式地批判与否定，忽视了沟通的价值。“卡什没有去瞧他”、“卡什没有回答”、“卡什没在听”^{[4]34}，珠尔“漠不关心她的死活”、“低头离开了”。在充满荒诞的沉默中，他们各自独立地生存着，成为同行的“陌路人”，更难以在现代悲剧中找到灵魂的救赎。正如萨特所言，沉默是现代人唯我论的行为实践，“我就像是独自一人在世界上那样行动；我擦着‘人们’就像我擦着墙一样。”^{[19]467}。本德仑一家不仅背弃了血脉亲缘，更将仇恨作为交流的工具，使“我的血永远的在你的血液中留下标记”^{[4]144}，在裂痕中寻求着属于自己的身份认同。在少的言语交锋中，大量的断裂、矛盾暴露出来，构成了无法沟通的客观困境。瓦德曼视角下的孩童叙事虽然以最基础的词汇组织起来，却显得绕口、跳跃，前后矛盾。“俺娘是条鱼”、“珠尔的娘是匹马”。在重复累赘的叙述中，瓦德曼受到达尔、珠尔，甚至杜薇的排斥，“闭嘴吧”，“除了一条鱼，我从他嘴里什么也问不出来”^{[4]62}。这预示了在现代价值中人与人之间的区隔，在孤独中的苦难隐忍成为了自我感动的笑柄，而救赎也愈发成为私人化的解释。

借助“现代性沉默”，福克纳以苍凉的底色隐约暗示出了其他诸种因素的反讽效果。如安斯在“失语症”的困境中忽视了对家族的领导力，导致家族四分五裂，子女的性格走向虚无与极端。杜薇在缺乏沉默的家教环境中丧失对性的认知，以及爱的能力；珠尔被私生子的身份桎梏只得以暴力代替言语；达尔成为沉默中爆发的理想者，却又成为家族心照不宣的牺牲品。这些都是福克纳在神圣母题的反向建构中表现的内涵，他们构成了文本背后巨大的反讽与批评空间，给人以振聋发聩的审美体验。

四、结语

在《我弥留之际》中，福克纳凭借其对《圣经》传统的接受与透析，以反向建构的模式创造出一幅荒唐、可笑的“现代神话”，讽刺了原初意义上“苦难与救赎”母题的神圣外衣。这一对传统母题的解构过程本身就富有巨大的美学意义：通过光明与黑暗、神圣与卑劣、痛苦与愉悦等要素的二元对立，作品在喜剧的圆满框架内实现了悲剧内核的升华。

但对于福克纳而言，作品的宗教因子、悲喜剧题材与反向建构策略都是组织文本的手段，他所追求的是更深层次的审美性。这是对针对现代性的诗性反思：如何在信仰危机的社会保持理性与本真，如何在文化冲突中固守善良，如何在物欲横流的罪恶中得以精神净化等等。所以，《我弥留之际》中的本德仑一家无非是美国南方人，乃至全部现代人的缩影。他们对“苦难”、“救赎”之义的漠视，他们身上卑劣、自私的人性之恶，都以必然却隐含的方式囊括在现代人的身份认同中。

从更大意义上看，《我弥留之际》的“反向建构”不仅拥有自足、完整的审美内涵，更构成了福克纳“约克纳帕塔法世系”的一部分，成为“阿特柔斯房屋的倒塌”^④的一瞥。这部作品的形式完善和丰满了福克纳的文化审美视角，更渗透着作者本身对现世状况下对罪恶与人性本质的反思。

④“阿特柔斯房屋的倒塌”喻指因为罪恶和不可抗拒之痛苦的承担而导致的一种人在本质方面的失落。其故事本源见于古希腊阿特柔斯家族的血亲仇杀传说，在诅咒之家族之间关系破裂，最终走向衰落。学界认为，福克纳在包括《我弥留之际》之内的多种小说中，逼真再现了关于罪恶及其所折射出的人本质堕落的主题，更聚焦了故事中“倒塌”和“衰败”趋势蕴含的隐喻性文化指向。

参考文献

- [1] J. Robert Barth, S. J. Religious Perspective in Faulkner's Fiction : Yoknapatawpha and Beyond[M] , Indiana: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72:107-108.
- [2] Frederick L. Gwynn and Joseph Blotner. Faulkner in the University: Class conferences at the University of Virginia[M],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59:87-92.
- [3] 袁秀萍. 威廉·福克纳批评与研究[M], 成都: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6.
- [4] [美] 威廉·福克纳. 我弥留之际[M]. 蓝仁哲,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5.
- [5] 邱炳钊. 创世记注释卷 4[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0.
- [6] [苏] M. 巴赫金. 拉伯雷研究[M]. 李兆林, 译.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
- [7] [奥]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自我与本我[M]. 林尘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 第 37 页.
- [8] [法] 勒内·吉拉尔. 替罪羊[M]. 冯寿农译.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2.
- [9] [德] 费尔巴哈. 基督教的本质[M]. 荣振华, 译.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97.
- [10] 吴玲英. 论《复乐园》里耶稣基督的神性与人性: 兼论《基督教教义》中耶稣基督的身份[J]. 外国文学研究, 2013 (1): 79-87.
- [11] Leland Ryken. Words to Delight: A Literary Introduction to the Bible[J], Baker Book House, 1992(3):131-136.
- [12] [法] 阿尔贝·加缪. 西绪福斯神话[M]. 郭宏安,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3.
- [13] Patricia R. Schroeder. The Comic World of *As I Lay Dying*. In Doreen Flower and Ann J. Abadic, *Faulkner and Humor*, p44.
- [14] 贺相铸. 加尔文《基督教要义》思想研究[J]. 名作欣赏, 2015(3):22-25.
- [15] [美] 布鲁姆. 如何读, 为什么读[M]. 黄灿然,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1.
- [16] Jean Stein, William Faulkner: An Interview-Three Decades of Criticism[M], East Lansing: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60.
- [17] Michael Millgate. The Achievement of William Faulkner[M]. Nebraska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78.
- [18] Cleanth Brooks. William Faulkner: First Encounters[M],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3.
- [19] [法] 萨特. 存在与虚无[M]. 陈宣良, 译. 北京: 三联书店, 2012.

Divine deconstruction and modernity carnival
-- Research on the reverse writing of the motif of "Suffering and Redemption" in *As I Lay Dying*

Han Shengjie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 Hunan Province, 410082)

Abstract: "Suffering and salvation" is an important motif in the biblical tradition. Faulkner continued to use this motif in his novel "As I Lay Dying", telling the ten-day funeral of the Bundrens. However, beyond the sacred cloak of the "Bible" motif, the novel uses the irony of emotional opposition, exposing the absurd essence of the "journey of suffering", and rejects the possibility of people's salvation by constructing the "non-hero" group portraits. Among the multiple negative connotations, Faulkner strip off the sacred cloak of the motif of "suffering and salvation", hinted at the spiritual wasteland of modern people and gave modern philosophical thinking during the confrontation and fusion of literary poetic and religious divinity.

Keywords: Faulkner; *As I Lay Dying*; Suffering and redemption; Reverse writing; modernity